

寻找思想史中的失踪者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著作集》翻译研讨会综述

Searching for the Lost Martin Luther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 Summary of the Translation Seminar on
The Works of Martin Luther

岳丽

YUE Li

作者简介

岳丽，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 YUE, PhD student, Shanghai University.

Email: 15343624363@163.com

Abstract

On 16 December 2020, Shanghai University held the “Founding Ceremony of the Sino-European Center of Shanghai University and Seminar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rtin Luther” under the title of “Searching for the Missing Person Martin Luther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in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formats, with more than 350 participants. The seminar was organized around five themes: the holistic value of Luther, the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value of Luther, and the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Luther. This review tries to summarize the important speeches shared at the seminar.

Keywords: Martin Luther, history of thought, translation, Reformation

2020年12月16日，上海大学以“寻找思想史中的失踪者马丁·路德”为题召开“上海大学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成立大会暨《马丁·路德著作集》翻译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特聘教授黄保罗教授发起，上海大学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清华大学道教与宗教研究院景学中心联合举办。350余位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等国内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相关领域研究者以及澎湃新闻记者、中国民族报记者旁听了此次会议。线上线下参与者共计350余人，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路德学术盛宴。

作为宗教改革的标志性人物，马丁·路德对德国乃至欧洲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汉语学术界似乎处于失声状态，相关研究并不充分。深查原因，这种现状与文献翻译和出版不足相关，使得研究者和读者只能徘徊、游离于其思想之外。正如会议发起人、上海大学黄保罗所言：“路德是中世纪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行为和思想终结了中世纪，开启了现代性。但在21世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汉语学界（除宗教与宗教学之外），路德的著作、思想和影响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路德仅仅被狭隘地理解为一个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汉语学界对他在社会、政治和整个思想史领域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所知甚少，路德成为‘思想中的失踪者’。本次研讨会以‘寻找思想史中的失踪者马丁·路德’为主题，希望能推动路德著作集的中文翻译和出版工作，使汉语学术界的研究者们突破语言障碍进入路德思想的海洋，帮助汉语学术界全面了解路德，匡正汉语学界五四以来西学引进的片面性。”

研讨会设立了五个分议题：“路德的整全性价值”“路德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价值”“路德的哲学思想史价值”“路德的哲学文化价

值”“路德是现代性开启者”。^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研究员、清华大学哲学院黄裕生教授、武汉大学赵林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等知名学者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参与了此次讨论。研讨会的讨论和论文将在《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或SHU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公众号中逐一发表推送。^②本文围绕研讨会主题，总结与会学者的发言内容。

思想史中的缺失者马丁·路德？

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们分别从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维度评判路德及其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并从各自的角度回应了路德是否是“思想史中的缺失者”、路德为什么会成为“思想史上的缺失者”等问题。

黄保罗首先指出，路德一生著作等身，但汉语学术界仅翻译出版了少数几本，从汉语学术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来看，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路德。此外，在很多汉语学界研究者的思考中，曾经开辟了现代性的马丁·路德失踪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袁朝晖认为，是文献、文本翻译不足使得路德成为汉语学界思想史中的失踪者。此外，汉语学术界对路德的很多理解似是而非，亟待修正。这些现状造成我们对马丁·路德及其生活时代有诸多误解，并直接导致我们对西方社会、西方国家了解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同意文本翻译滞后是路德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主要原因。中国的研究者如果希望将“散落的珍珠”串

^① 日程安排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qI_L8SxG6bJdVEHQi_Nt7A。[The detailed schedule please see the link.]

^② 参会论文及讨论内容参见《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www.SinoWesternStudies.com）或SHU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公众号。[Presented papers at the seminar will be published a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and WeChat of SHU Sino-Europe Center.]

连、让路德进入思想史而非游离于思想史、在一些关节点上标识西方的思想转折，需要进一步还原、梳理路德的思想，而非止步于一般性的信仰解说。

清华大学黄裕生直言，就基督教演化史和西方整个文化世界而言，路德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物。遗憾的是，路德在东方世界一直只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他的神学家和思想家身份常常被忽略，作为他所引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基础的神学思想以及相关学说也总是被忽视。事实上，没有路德的新神学，就不可能有路德宗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汉语学术界，路德确实是思想史中的缺失者。

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则强调不能笼统说路德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路德的新教变革在基督教之外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中一直享有显赫地位。山东大学孙立新乐观地表示，路德并未完全消失，在国内哲学、神学、历史学、社会学研究中都有其身影，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提高。

路德的神哲学思想价值

路德生活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型时期，他一方面深受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行与思不断尝试矫正、修补既存的思想之网。路德是伟大的改革者，其思想对后世神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学者们从《圣经》诠释、神学体系建设、德国现代思想演变等角度深入讨论了路德的神哲学思想价值。

路德的宗教改革与《圣经》的翻译与诠释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他从自己身处的时代重新诠释“因信称义”，引发了这场巨大的变革并开启了现代性思考。四川大学田海华指出，路德本人释经时虽然遵循了四重解经法的传统，在文献学和修辞学上也受到了哲罗姆、奥古斯丁、卡西奥多路斯（Cassiodorus）等古教父的影响。路德意识到四重解经法的局限性，因此逐渐回归《圣经》，强调并坚持《圣经》的

权威性。

山东大学谢文郁聚焦路德讨论圣餐解释的文章以及由圣餐解释引发的诠释学问题，介绍了路德批判罗马教会的圣餐解释时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说法：对理解者之理解的诠释和理解导致文本本身被忽略，以至于与圣餐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圣餐的含义”“圣餐对信徒生命的意义”等的诠释被完全搁置，出现了“诠释中心位移现象”。谢文郁强调，路德确立了文本和诠释之间一条根本原则——诠释必须维护文本的中心地位。这个原则是当代诠释学的核心，成为古代圣经注释和当代文本诠释的分水岭。路德的这一思想史贡献不仅对理解西方的当代诠释学具有深刻意义，对中国诠释学的建构也有深远意义，值得引起更多重视。

武汉大学翟志宏教授转向了路德所接受的神学思想传统。他指出，托马斯·阿奎那在中世纪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自然神学体系，但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受到了多方批判。其中，路德的批判体现了一种基本的立场与倾向，并在随后西方思想的演进中产生了广泛的回应与影响。翟志宏的论述介绍了加尔文、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普兰丁格（Alvin Carl Plantinga）等思想家所接受的路德影响，对路德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新的思考。

南开大学张仕颖补充说明宗教改革前的马丁·路德虽深受经院新学影响，其神学思想当时也建基于此，^①但因其神学思考的重心是罪与拯救问题，困惑在于上帝的仁慈和公义之间的矛盾，对经院新学乃至整个经院哲学进行了批判，引发了神学与哲学关系、理性的限制与作用的新思考。路德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亚里士多德和圣餐论，前者主要集中于人类中心主义，基于演绎逻辑的神学探究方式、伦理学与称义观；后者则是针对托马斯主义的化体说和实体学说。

^① 张仕颖：《宗教改革前马丁·路德与经院新学》，载《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20-135页。[ZHANG Shiyong, “Martin Luther before the Reformation and Neoscholasticism,” *Historical Research*, no.6(2013):120-135.]

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从社会学角度重新解读路德的宗教思想尤其是路德“因信称义”教义的提出。在路德所处的时代，新型民族国家建立、货币和市场主导社会经济发展趋向、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明显分开、教育文化普及个体性日益显现，人与上帝的关系和个人与社会群体的矛盾逐渐凸显，社会道德伦理涉及到人的个体行为越来越多。路德发展了对神秘主义的“Nichts”理论，将人的存在区分为本质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将“无”和“原罪论”结合，强调人人都能阅读福音书得知上帝的话，由此取缔罗马教会竭力推行的赎罪券，破除传统的赦罪观念，提出了“因信称义”教义。

北京大学徐凤林在曼多玛（Tuomo Mannermaa）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东正教神学家观点，进一步比较了路德的“信”与东正教的“成神”思想。徐凤林认为，路德的“因信称义”与东正教的成神思想各有所长。路德的赎罪称义观与东正教神学家面向未来的末世论诉求相比更具有此世的现实性，东正教的成神论神学则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路德把对人的改造和成神完全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依靠“在信中真实临在的基督”来实现神化；东正教的神学一入学力图把人的改造和成神贯穿于信仰者的全部教会生活过程中，帮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到和坚守“信”，因而比路德的“因信称义”更具有教会实践意义。

台湾神学院林鸿信重申了路德神学思想的辩证特质。他指出，路德介于律法主义与反对律法主义之间：一方面藉由主张“自然秩序”与“两个国度”坚持律法主义，呈现出重视秩序的一面；另一方面藉由分辨“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反对律法主义，呈现出强调自由的一面。路德努力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追求“自由中的秩序”与“秩序中的自由”。

复旦大学孙向晨转向了德国近现代思想史，讨论路德与黑格尔的关联。他指出，黑格尔将历史哲学区分为希腊的、罗马的、东方的、日耳曼的四个部分，并将日耳曼的定义为现代世界，那么日耳曼现代

世界的起点即是路德。在黑格尔眼中，路德与苏格拉底并驾齐驱，路德是苏格拉底代表的希腊哲学的再兴。

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分析了路德思想中的自由、理性与爱。路德从哲学、人类学、社会、政治等视角将自由区分为“作为人性或人的本质的自由；作为社会成员的自由；人摆脱罪恶、摆脱败坏、摆脱律法的自由”三个层面。何光沪认为，路德的自由思想是康德哲学、启蒙运动思想的思想来源，理解路德思想是理解西方哲学思想的重要环节。

清华大学黄裕生认为，基于路德新神学的宗教改革运动本身直接推动了西方走向现代性世界，路德神学直接影响了启蒙思想特别是德国启蒙哲学的发展。黄裕生演绎了路德神学思想对启蒙哲学的影响，从“人类个体具有本位地位，并且因而是平等的；人类个体的本位地位是基于其自由；一切传统、历史、制度并不具有天然的权威性，它们都能被重估，且需要被重估才具有合法性”等三个命题出发展开论述。

山西大学江怡比较了路德的理性吊诡和康德的理性批判，并指出，路德的思想虽然没有达到康德理性批判的高度，但不能否定路德思想是后世哲学重要思想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另辟蹊径，通过分析康德的《圣经》诠释思想回溯了路德对康德的影响，比如，康德提倡的“普遍的道德立法”思想与路德的“人人皆祭司”不谋而合。他认为，康德本人诠释《圣经》的四项原则受到了路德的影响，既有与路德思想一致的地方，又有对路德唯凭《圣经》、唯凭信仰、唯凭恩典等原则的修正。李秋零还指出，路德宗教义是康德晚年思考的重要对象，值得从更广的方向上考虑路德思想对康德的影响。

清华大学瞿旭彤着重分析了路德的十架神学对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影响及其在基督教神学、欧洲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汉语学界应更多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浙江大学曾劭恺与此呼应，提出路德十架神学对现代欧陆哲学的影响在当代中外文献中都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曾劭恺说明，路德的十架神学透过康德、黑格尔等现代哲学家影响了巴特，帮助巴特在其神学思想成熟时期（1936年以后）回归路德十架神学，回应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历史主义两大自由派神学路线。

路德的政治思想价值

华中科技大学林纯洁等学者聚焦路德的政治思想影响。林纯洁指出，路德在奥古斯丁“两座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王国”“两种治理”，主张区分政治权利和宗教权利，这是路德对“凯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的进一步阐释。路德在理论上重建政教关系，实践上反对宗教战争，肯定了世俗权力的正当性。路德权力分离主张为西方政教分离和国家世俗化的近代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近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起源，推动了欧洲近代社会的形成。

云南大学钱金飞认为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使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大教派同时并存，德意志不得不实行宗教宽容，宗教最终与政治相分离，帝国从一个中世纪国家转变为近代国家。路德引发的诸侯宗教改革运动，有利于领地国家君主的国家构建和渗透。路德引发的乡村宗教改革，有助于乡村民众通过宗教改革运动抵制诸侯的“教派化运动”。因此，宗教改革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应从多方面评价路德宗教改革对近代早期德意志政治发展的影响。

山东大学孙立新从历史学角度追溯了宗教改革与德意志近代国家形成的关系。他谈到，路德提出的“因（唯）信称义”教义，打破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对于宗教救赎权的垄断，创立了由诸侯充当教会首领、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邦国教会”体制，在德国创设近代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刘清平从概念史视角对路德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和解读。

他认为虽路德延续了“因信称义”理念原初的悖论，同时又赋予其某些原创性的内涵，例如坚持信仰和道德的分离，彰显信仰对人生的现实意义。换言之，路德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阐发了“因信称义”理念，开启了新教传统，促成了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转型并影响至今。

南开大学于涛探究了路德宗教改革对北欧福利社会形成的影响。他言明，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的一些教义是北欧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思想来源，新教教义相关理念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作为一场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对推动北欧福利国家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湖南师范大学罗衡林考察了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认为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和立场是矛盾和反复的，经历了“反犹—亲犹—仇犹”的过程。1517年宗教改革之前，路德基本上是反犹立场；1517年至1524年，路德对犹太人态度好转。其中，1923年发表的《耶稣基督是一位天生的犹太人》被多次再版，其亲犹思想被广泛传播。1924-1532年，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处于转变之中；1532年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变得恶劣起来。在早期新教阵营中，路德的仇犹最具代表性，但当时路德绝非唯一的反犹人士，反犹是当时基督教世界中一种普遍的现象。罗衡林强调，路德等人的反犹思想及其建议虽然在新教教会圈子极有市场，但在当时的德意志还没有变成国家当局的行动，因而并未产生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汇集国内相关领域的诸多优秀学者，引起了较大反响，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有推动作用。学者们一致同意，路德具有很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应从基督教会史、德意志民族国家、现代性世界三个方面探讨，突破学科界限，采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将路德置于德国、欧洲甚至全球历史发展的视野中去评判、考察。此外，研究者不能囿于基督教发展史范围内，应该从更为广阔的政治、思想、文化等视野出发，重视路德著作集的翻译和出版，掀开层层面纱、重返历史现场、无限接近真实存在过的路德。